

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探析

贺尊*

摘要: 资本是运动的,运动是有成本的,资本运动成本的最小化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驱力。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是我们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的一次理论创新的结果,它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这预示着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作为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引擎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 资本运动成本 方法论 首要规律

一、引言

确切地说,“运动成本”一词并不属于经济学家精确定义的专业词汇。因此,有必要在前言部分予以阐释。但我觉得要从这篇文章的内容上对该词给出一个连贯完整的概括并非易事。事实上,我试图从时空体验中抽象出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运动成本“假说”,诠释为什么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它感兴趣。因为在唯物主义看来,“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才有运动”,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同理,经济社会的运行,不论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当然也是一种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不可分离。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是在时间、空间构成的时空里运动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借助物理学的方法以及摩擦无处不在的事实,我们把社会生产力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力”,类比为在时间、空间的变化和运动中发生的——运动成本,即运动成本存在于经济活动的时空中;运动成本作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摩擦力,一方面表现为资本运动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运动的空间成本。

运动,就最一般意义来说,是物质存在的固有属性,“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运动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驱动力:人类借用日行百里的牲畜马力,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农业社会;利用蒸汽和机器的发明,制造日行千里的火车和轮船等工具,进入到大工业社会;利用互联网络的传播速度,压缩时空使空间距离(s)与运动时间(t)趋近于零,运动速度($v = \frac{s}{t}$)趋向于无穷大,人类社会跨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流动空间”。

* 贺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4;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81,电子信箱:hezun66@163.com。

时空是物质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的普遍的表现方式,是一切物质形态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运动依赖于时空,时空属于运动,时空与运动相统一。参见周扬明:《时空经济学论纲》,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8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491、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491、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透视时间消灭空间的历史景观,可知:1500-1840年,帆船的时速为10英里;1850-1930年,蒸汽机车平均时速为65英里及汽船平均时速为36英里;1950年代,时速为300~400英里的螺旋桨飞机产生;1960年代,时速为500~700英里的喷气式客机诞生;1970年代以后至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与计算机将人类带入一个虚实交替的流动空间,世界变平了。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文版,3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运动作为物质文明生产的必要条件,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组成部分,没有运动,生产内部的各环节就无法联接;运动是生产过程的继续,联结生产与再生产、生产与消费的环节,联结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联结着城乡,联结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由此可知,运动是经济社会的普遍表现形式。不言而喻,资本作为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括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由此而论,成本可理解为资本运动的摩擦力,利润可理解为弥补资本损耗再投入的成本;成本与利润的矛盾,构成经济活动中资本运动的属性;降低资本运动成本,在运动中创造利润,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显然,资本运动成本越低,利润就越大;资本运动成本越高,利润就越小;这一“运动规则”——贯穿于经济社会活动的始终。

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散见于他的《资本论》及其他有关经济学著作中,本文对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进行专门探讨。

马克思以资本为中心建立了《资本论》的严密体系和结构,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运动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利润。显然,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化身”,须通过节约资本运动成本来实现。在此,笔者撇开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剥削关系,立足社会生产力的视域,用纯粹经济学方法来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

二、社会生产力与资本运动成本的基本联系

在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看来,“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可见,这里提到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指的就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由此看来,生产力是人类为了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改造自然,在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劳动力、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力成为生产力源泉,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要素。劳动生产力作为制造商品使用价值的价值的能力,只有在生产力质量合乎规格的基础上,即“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才能发挥作用——决定商品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显而易见,“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能力,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耗费的多少来表示,呈现的只是生产力的“静态”;而用资本运动成本的高低来衡量,既传递生产力的“动态”,又显示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张力。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正是因为人——作为劳动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在机器和技术中承担着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角色,是资本运动成本的引起者、调整者和控制者,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主要体现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以下各种情形中。

首先,从劳动者的质量来看:生产力决定于“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并且“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于是,“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力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⑩。由此看来,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使人的时间价值(即每小时的支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121~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提醒读者注意:“决不要把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同利润或资本赢利相混淆,后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常常甚至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本文立足于社会生产力视野,不在资本的利润和剩余价值这种“细微的逻辑细节”上浪费笔墨及时间。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张薰华:《资本论 脉络》,第2版,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价格)得以提高,“产品中与物资资料所附加的价值相比,劳动附加的价值提高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因而相对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价值的提高。可见,通过教育作用于人力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理念,早就孕育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当今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劳动者“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正是这一理念的发扬光大。

其次,从机器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应用程度看:“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首要方法是更细的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正如亚当·斯密在观察一个制针厂的每个工人每天可生产4800个针时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但在两个世纪以后,英国剑桥大学的克利福德·普拉顿教授在参观一家造针厂时,发现每个工人每天的平均产量为800000个针,此时的劳动生产率比斯密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整整提高了167倍。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愈更有效率”的情形下,才能充分发挥“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等等。”“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⑩由此可知,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降低了资本运动成本,且这种资本产生的增长率被索洛(Solow,1957)在“技术变革和扩大产品功能”的文章中给予了验证。^⑪

最后,从“自然条件”看:既然自然条件(人、资源、环境)也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就不应该将自然环境及其提供的资源排斥在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之外。“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归结为人本身(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⑫人本身的自然表现为智力和体力,人的周围的自然表现为生态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过程。”^⑬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经济存在于大自然中,自然环境已成为经济的一种“生产条件”,破坏生活环境就意味着破坏生产环境。“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人对另一部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⑭如果资本积累仅仅靠不断地从全球环境中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蜕变成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这将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引发人类与自然的潜在性灾难与冲突。恰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通过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受有形资本的巨大破坏然而生产又快速恢复的德国和日本,发现管理者的经验和工人积累的技能等资本并没有遭到破坏,这些人力资本为工业的复兴提供了基础,能够不断地增加边际收益而不是减少边际收益。参见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文版,175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谢勒:《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文版,1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4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381~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⑪谢勒:《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文版,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207~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文版,7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然界的。”所以,马克思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力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因而他在《资本论》中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进而说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地球(或土地)物质变换关系的削弱形成了制约因素,迫使其“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进行自觉地合理经营。”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发展观所在吗?只要我们循着马克思这一思维继续探究,就不难判断:一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被外化,自然条件作用于劳动生产力所引发的“反作用力”,将使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自然条件不再成为促进生产力的“生产条件”,反而成为阻碍资本运动的摩擦力,最终导致资本运动成本的增大。可见,“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毫无疑问是降低资本运动成本的“润滑剂”。

总的来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随着劳动者质量的提升、机器及科学技术的变革、自然条件的保护而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越高,资本运动的摩擦力就越小,则资本运动成本就越低,体现为:“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小,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相反地,社会生产力越低,资本运动的摩擦力就越大,则资本运动成本就越高,体现为: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与资本运动成本之间存在反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问。”

三、剩余价值率与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⑩ 剩余价值的生产,既是整个资本运动的轴心,又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运动产生的利润,是在“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在劳动时间以上的超过部分”的基础上实现的,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压榨工人工资、降低资本运动成本来提高资本的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的以下精辟分析^⑪,揭示了剩余价值率与节约资本运动中的时间成本的实质关系:“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部分为前提。”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马克思认为,较高的剩余价值率,不仅要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来提高,不仅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来提高,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率)或劳动强度来实现。可见,劳动时间——可还原为一定数量的资本在创造商品价值所耗费的运动成本,即资本运动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凝结在商品的抽象劳动中、体现在劳动力价格(劳动工资)的高低上。而“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517~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9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载《经济研究》,2003(2)。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83~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其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降低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工资成本所占比例,实现节约资本运动成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目的。所以,马克思把一切节约高度概括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而劳动时间的节约——本质上可还原为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诚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可相对增加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可降低资本运动成本。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劳动时间的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一方面外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内化为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如福特于1913年建立了他的T型汽车流水生产线,目的在于使生产中的效益最大化,使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即把时间和动作精密地纳入劳动空间的组织过程中,时间环环衔接,使流动的摩擦最小,加快了生产中资本周转的时间),结果,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成本从12.5小时降至10秒,使汽车价格降到它最初的1/10。由于降低了大量流水线(运动)中的时间成本,产品价格显著下降,据此福特公司降低了汽车零售价格,1925年的销售量超过了1500万辆。由此可知,“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创造利润——控制资本运动成本到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成为资本增值的重要秘诀,成为提高剩余价值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可见,节约资本运动(的时间)成本,不仅是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即利润实现和分配的经济逻辑,而且是提高剩余价值率的重要手段。

四、资本积累与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首先把资本运动总过程分解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组成部分,然后对各部分进行周密的分析,“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态”。在《资本论》中不难发现资本价值增值规律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资本周转为手段,达到生产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目的,达到创造和占有利润的目的,进而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显然,“资本不是一般的货币和资金,而是在运动中带来商品价值的价值、不断增值的资金”,其目的总是最大化地谋取利润的资本积累。当然,仅靠从量的扩张方面“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⑩,实现由资本积累到社会财富的积聚,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劳动条件的优劣程度。”^⑪由此可见,质的提高即提高资本运动效率,已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

我们知道,资本运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表现为劳动时间的节约。所以,“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⑫资本作为社会财富,体现为劳动时间的凝结,因而浪费社会财富就意味着劳动时间的浪费,进而最终归结为资本运动成本的增大。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黄铁苗:《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371~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史库森:《经济逻辑:微观经济学视角》,中文版,117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载《经济研究》,2003(2)。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9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 ,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 ,那么依照马克思的思路,对形成社会财富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本要素运动成本的节约可还原为生产时间(成本)的节约。“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方法又有哪些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方法”的考察,使我们不难发现:提高资本运动效率——降低资本运动成本——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思维逻辑。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资本积累取决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资本的运动之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使资本运动速度加快和运动成本降低,以获取更多、更快的资本积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大工业、社会分工和世界市场使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发展,结果,节约资本运动成本的自觉行动,成为决定每个生产者成败和盈亏的普遍社会强制。生产者的全部活动和产品都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都依赖于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的交换时,他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成本,只有在与已经成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等价交换中才能为社会所承认;与其不然,不仅白白地浪费了,还会招致亏损甚至破产。可见,价值规律的全面运行,迫使生产者要千方百计提高资本运动效率,降低资本运动成本,节约单位商品生产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上的时间成本。这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积累的“正向运动”。然而,这种正向运动的牵引力,始终会受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块“天花板”的阻挡。因此,资本一旦谋取到“反向运动”的机会,就会暴露出疯狂追求超额利润的举止,以达到相对提高资本运动效率、实现资本跨越式积累的目的。马克思很清楚资本的这一“德性”：“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进而表现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由此不难发现,资本“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相互循环的运动轨迹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本运动效率的提高←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诚然,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对静态的,而资本运动效率的变化却是具体的、动态的;随着劳动时间的节约,相对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促使资本运动效率的提高、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作用于资本运动的效率也就越高,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生产的运动成本,创造出更多的资本积累转化为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可见,资本积累自始源自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

五、全球化的流动空间与资本运动成本的回应

马克思缘何在《资本论》中宁用“时间的耗费”来阐述商品价值量中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工资成本,而不用资本的“运动成本”计算商品价值的成本及利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溯到马克思生活的观念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去。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是为了阐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的剥削本质及其内部矛盾。当《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时,马克思曾指出:“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以至于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100~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黄铁苗:《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7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王珏、吴振坤等:《资本论》介绍,第1卷,1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很显然,出于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于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身,希望从中寻找到在政治范围内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理由。列宁也认为,《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阐述“商品拜物教”时,就特别强调“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就是说,生产产品时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本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但未径直表现为劳动时间,而是表现为劳动产品这种物质形态具有多少价值量。最后“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倘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成本——利润分析工具来审视,取得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实际上就是资本投入产品生产的成本,当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通过商品价值——以市场价格为显示器——高于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即工资成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产品利润即可实现。显然,马克思“为了不用一些词和概念,就得用另一些词和概念来代替,只要新的词还没有被找到,往往就由旧的词担负起决裂的使命。”同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据。由此可见,马克思为了“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有利于工人阶级理解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直观地用“时间的耗费——剩余价值”等概念和词,而不愿用“成本——利润”甚至运动成本等词和概念,可能是缘于“理解价值的义务”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需要。

众所周知,任何时代的理论和思想的背后都隐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时空体验。与物质及其运动毫不相干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对于17-18世纪的人来说是易于理解的。“时间相对于空间是完全分离并且独立的”,这在当时被大部分人当作常识。各种社会理论(包括发源于马克思、韦伯、斯密和马歇尔的各种传统)一般都在各自的阐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就连后现代思想家福柯也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曾经迷恋于空间隐喻,想知道为什么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空间被当作死亡、凝固、非辩证和稳定来对待”。而相反,“时间却是丰富性、多产、生命、辩证”。基于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因而“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恰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的农民都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时间……在这里,花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不仅对于相互交换的产品量的数量规定来说是惟一合适的尺度;在这里,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尺度……他们不会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而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⑩由此可见,时间成为衡量劳动力(价格)成本耗费的工具,成为市场交易的媒介,成为可以具体感觉到的东西;时间成为那个时代可以接受的正统,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最直观的“测量器”。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特别强调了时间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原则^⑪,把劳动时间的剥削和社会的再生产纳入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中。由此不难发现,时间成本作为资本运动成本的雏形,依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约束。

如果我们继续用回忆的眼光加以透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⑫以至于作家查理斯·兰姆感叹:“世间万物没有任何东西像时间和空间那么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中文版,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译本,第19页)的这段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版序言中可以找到印证。马克思说:“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削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内运动。”这一主要矛盾,恰好击中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论据贫乏但又一味乐观的弱点和要害的“本原”,也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澄清和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278~2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中文版,29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文版,2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88~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1016~10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⑪吉尔·利波维茨基、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中文版,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⑫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中文版,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我困惑。然而,因为我从来不去思考时间和空间,所以它们带给我的烦恼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少。”继而史蒂芬·霍金也感受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不去忧虑时间和空间,不管它们为何物;但是我们所有人有时极想知道时间是什么,它如何开始,并且把我们导向何方。”直到黑格尔-爱因斯坦的这段时期,随着时间和空间概念在物理学与数学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脱离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就不能被接受了。如此一来,人们发现不仅物质是可以改变的,空间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处于20世纪的人类,对时间-空间-运动的理解不再困难;尤其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人们对经济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成本现象几乎都习以为常了,经济成本已成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诸如时间成本、空间成本、流转成本、交易成本等等,都是资本运动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既然如此,缘何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忽略了时空因子,没有重视资本运动成本这一随处可见的经济现象呢?假定“经济在一个毫无空间向度的幻想世界中全都集中于一点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瞬间”完成交易。按照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的解释,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时空”(运动)问题不感兴趣,而是也把它看作“重要的不解之谜”。由此可知,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特定时空体验,使人们很难穿越时空把“时间-空间-运动-成本”纳入“四位一体化”的生产和交换的理性计算中,通过市场价格体系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序列作用。也就是说,配置资源的运动成本愈小,则资源配置的排序愈靠前,相反,配置资源的运动成本愈大,资源配置的排序愈靠后,甚至很难被配置使用。

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社会资本要素,总是力求压缩时空,实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运动成本最小化。显然,速度不断加快的资本运动,“一开始就表现是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作积累要素)的运动。”伴随着商品生产的总过程,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孕育于马克思称之为“交往的世界性”中。所以,我们置身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场景,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何没有直截了当地(直接地)用运动成本的概念来诠释资本的运动规律,而是转弯抹角地(间接地)借助时间耗费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作用关系。

当然,作为思想视野广阔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资本运动成本当中蕴含的超越时空的经济内涵。只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空间基本上支持物质生产的外部环境,一种“中立”的东西,换句话说,空间是自然界提供的消费品。然而,在资本全球化运动的当代,空间已进入了生产领域。既然资本把空间由自然的消费品变成谋取剩余价值的生产对象,那么抵抗的途径——就在于用时间去克服空间,降低资本在“时空压缩”过程中的运动成本。正如马克思所言:“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很显然,马克思“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思想,把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的运动轨迹表达得十分清晰和通俗化了。尤其在分析商品流通是各个商品循环环节交错在一起的总运动时,强调流通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强调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和空间距离在时间上的缩短,还表现在交通运输工具的数量和依次运行次数的增加。流通过程所需要时间的减少,意味着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以最低的成本将适当的产品、在适当的时间、达到适当的地方,意味着利润的增加。正如戴尔(Dell)公司的快速营销反应系统,以市场链为纽带,以定单信息流为中心,带动物流和资金流的运动,实现“零库存、零营运成本和(与用户)零距离”,使戴尔的生产速度比其他电脑公司的快4倍,产品平均库存不超过2小时,零配件库存控制7天以下的

史蒂芬·霍金:《果壳中的宇宙》,中文版,31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3)。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文版,37~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参见王桂泉、许海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新华文摘》,2008(17)。

王珏、吴振坤等:《资本论》介绍,第2卷,13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周转量,因而其平均成本比竞争对手低 10%,不但能用低于竞争对手 5%~8% 价格销售相同配置 PC 产品,还能获得比其他公司更高的销售利润。看来,降低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管理中的运动成本,是戴尔公司先后超越惠普、IBM 等公司的秘笈。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认识到,压缩时空,降低物流、资金流和工作流中的运动成本,是提高企业资本运动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由此可知,资本运动的发展逻辑是:不断地加速生产(组织通过转包、外购等垂直分解形式来实现),不断地加快商品周转速度,不断地压缩市场流通时间,不断地提高单位时间内资本要素运动速度的变化量,即力求提高资本运动的加速度($= \frac{dv}{dt}$),以实现降低资本运动成本的目标。总的来看,随着时空概念的不断进化,从节约劳动时间的理性——演化到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无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光芒。

在马克思看来,“时间的节约,以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因而我们有充足理由推断,马克思所指的时间节约规律的含义与节约资本运动成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规律的两种不同语境的描述。诚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必然的暂时性,并随着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在 21 世纪的当代,“流动空间”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领域,“时空压缩”理念的迅速流行,导致了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时间尺度的意义”难以继承,存在的只是时空变化中的“运动成本的意义”。因此,运动成本概念的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溶液”中、在时空压缩的催化下“浮出水面”——显得特别有时代意义和顺理成章。可以说,资本运动成本的“思想种子”在全球化流动空间的催生下,落在了被马克思已耕耘好了的“交往的世界性”土壤里,享受着时空的“阳光雨露”,正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森林中的一棵树木。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资本的总运动 = 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例如,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打着资本自由运动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利润,“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而,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是基于集装箱化、大型喷气式飞机货物运输、卫星通信和互联网,它们使生产和设计指令能及时地在任何时间内传递到全球任何地方,传统上受到原材料或市场地点限制的工业现在变得特别地“自由”:一方面,通过一个由全球计算机网络、全球通讯网络、全球流通网络组成的新空间,创造出一种同时性和即时性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贬损等待和缓慢形式);另一方面,通过创造特殊的空间(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等)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加速运动,使经济交易周期越来越快,时空纳入到“成本节约至上”的信念中,最高限度地也是最低限度地缩减资本运动成本,成为经济活动的理性行为。资本获得了超越时空限制的巨大运动能量,使时间和空间距离压缩为“零”,运动速度趋向“无穷大”,从而大大降低了运动成本。因而,资本运动越国际化,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运动的市场就越大,资本也就越能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超额利润。这意味着在由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构造的新的时空运动里,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运动规律。

六、结语

总的来讲,在商品 货币 资本 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的运动过程中,劳动生产力与资本运动成本成反比关系,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源自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资本的积累源于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无不发现贯穿其中的核心——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毫无疑问,资本是运动的,运动是有成本的,资本运动成本的最小化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趋

于建原、李永强:《快速营销反应系统下的整合营销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4)。

贺尊:《论企业运动成本》,载《江汉论坛》,200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0 卷,12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5 卷,11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1 卷,25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6 卷,27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势和必然结果,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2008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25周年纪念日),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的业绩和再次强调我们对他的革命思想的有效性的坚定信念,而首先是为了“促使大家深刻地想一想,在考虑到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同时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如今,我们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动问题,在经济实践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发展经济科学,需要我们鼓足勇气,并非牵强附会的,而是旨在吸收马克思有关节约时间成本的思想精髓,从而“与时俱进”地提出资本运动成本的方法论,其意图在于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向21世纪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正是我们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的一次理论创新的结果,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当我们运用这一思想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际问题)的时候,发现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预示着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作为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引擎和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0.《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张薰华:《资本论 脉络》,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12.王珏、吴振坤等:《资本论 介绍》,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14.谢勒:《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1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6.马克·史库森:《经济逻辑:微观经济学视角》,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 1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8.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中文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19.史蒂芬·霍金:《果壳中的宇宙》,中文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20.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1.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2.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23.吉尔·利波维茨基、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4.周扬明:《时空经济学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5.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载《经济研究》,2003(2)。
- 26.黄铁苗:《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4)。
- 27.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3)。
- 28.王桂泉、许海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新华文摘》,2008(17)。
- 29.梁树发:《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及其启示》,载《新华文摘》,2008(18)。
- 30.于建原、李永强:《快速营销反应系统下的整合营销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4)。
- 31.贺尊:《论企业运动成本》,载《江汉论坛》,2007(1)。

(责任编辑:刘成奎)

梁树发:《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及其启示》,载《新华文摘》,2008(18)。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